

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

——“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

郑娟曼

提要 “我说呢”“我说嘛”和“我说吧”是由“我说”与不同的互动性语气词规约化而成的一组习语构式,其形式和功能在互动交际中浮现出来。文章结合这三个构式在会话互动中的表达功能,将预期分为所言预期和所含预期,并通过考察它们所在的会话序列厘清了预期的表达跟语言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发现,三个习语构式都可以表达合预期信息,但“我说呢”关联的是所含预期,“我说吧”关联的是所言预期,而“我说嘛”则可以关联两种预期。三者在功能和语境分布上的差异又为不同互动性语气词的客观分析提供自然语料方面的证据。

关键词 互动性语气词 所言预期 所含预期 会话序列

1. 引言

现代汉语口语中有一组有趣的构式“我说呢”“我说嘛”和“我说吧”,吕叔湘(1980/1999)和常玉钟(1993)已将“我说呢”定性为“习用语”,表示恍然,忽有所悟,而“我说嘛”和“我说吧”未被收录,也尚无相关的研究。但它们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1)整体意义都具有非合成性。2)“我”都不能替换成“你”或“他”。语气词也不能随意删除或替换,即使可以替换,功能也会发生变化。3)都是在“我说”的基础上加上互动性语气词(参看方梅,2016)①规约化而成。

“我说嘛”和“我说吧”跟“我说呢”一样都是习语构式,但功能各异。先看例子:

- (1) “真的?真有意思。那你也不是梦蝶了?”宝康问坐在他另一边的丁小鲁。“不是”“我说呢,我在台上还纳闷呢,梦蝶怎么换模样了,我记错了?别露怯。”(《顽主》)
- (2) 何九如道“你还没找到她,怎么会得全了紫贝叶……”韦慕岚脸上一阵奇热,只得说道“不,何伯,我已经找到了她,是她把两片紫贝叶都给了我……”“我说嘛。”何九如道“要不然你怎会得全了紫贝叶?”(《红叶情仇》)
- (3) 钟离春“孙先生让我救你们……”太子一愣“钟离姑娘?你怎么来了?”钟离春从暗处走出。一旁的将军喜出望外地“大将军,我说吧,军师不会坐视不管。”(《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
- (4) “你们要是怀疑我的话,我可比窦娥还冤呀!”徐毅哭丧着脸解释。“好呀!我说嘛!到底还是有问题,这不说着说着就露馅了,果真还有其他女人,现在说漏嘴了吧,窦娥!那个女人叫窦娥吗?说!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会话中的预期表达与回应研究”(项目号:18BYY169)的资助。修改时得到了方梅、吴福祥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完权老师多次提供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文献,《中国语文》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责自负。

① 方梅(2016)将语气词区分为互动性和非互动性两类。互动性语气词是言者即时交际的手段,语境里有其他言谈参与者,言者希望听者有所回应。

“窦娥是谗”(《大宋海贼》)

例(1)的“我说呢”表示忽有所悟,句末语调不能上扬,其中“说”重读。例(2)“我说嘛”可以替换成“我说呢”,“说”也重读且语调拉长,具有恍悟义,记为“我说嘛₁”。例(3)中的“我说吧”并非提出要求的言语行为,不能替换成“我来说吧”或“让我说吧”;也不具有恍悟义,不能替换成“我说呢”;句末语调可以上扬,寻求认同,此时“说”不重读^②;加强肯定语气时可用“我就说吧”“我是说吧”等。例(4)的“我说嘛”不能替换成“我说呢”,但可以替换成“我说吧”,也不具有恍悟义,我们记为“我说嘛₂”。四个用例中的动词“说”虽是经历体,但在编码时并不出现时体标记“过”,动词后也不带言说内容,说明“我说+呢/嘛/吧”已经习语化。根据替换关系,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我说呢”和“我说嘛₁”是具有恍悟义的习语构式。“我说吧”和“我说嘛₂”是不具有恍悟义的习语构式。

这几个构式的意义之间有何关系?同一形式“我说”的基础上习语化而成的构式是否存在共同的核心性能?互动性语气词“呢”“嘛”“吧”如何影响习语构式的意义和分布?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基于语言事实区分两组概念:单源预期与多源预期;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

2. 单源预期与多源预期、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

2.1 合预期信息的标记性

预期(expectation)是一个重要的语义范畴。语言学中的“预期”是说话者作出的假设或臆断,它具有主观性和可协商性。如“他比我聪明”“明天下雪”等,这些都是说话者的主观判断,是可以不断被自己或他人确认或修正的。观察和经验在修正他人或自己的预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所有的预期都担当了后期言行“参照框架”的角色(参看波普尔,1987:354-356)。在言语互动中,预期不断被确认或修正的过程便是话轮转换的过程,即发话者首先存在一种预期说明,发话者自身或受话者会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对先前的预期作出回应(response)。如果一个话段所陈述的情形跟该参照预期相一致,那么它表达的是一个合预期信息^③;如果不一致,而是偏离了某一参照预期,那么它表达的就是一个反预期(counter-expectation)信息;如果话段与参照预期无关联,则是中性(neutral)信息。在具体的语言中,中性信息是无标记的,而反预期信息的标记手段要比合预期信息的标记手段丰富得多。Heine等(1991:192)指出,副词、连词、重音、助词、语序等各种语言手段都可以标注反预期信息,并认为合预期信息是无标记的。谷峰(2014)提出“汉语里有没有合预期标记^④”的问题,并认为汉语中的合预期标记只有“当然”和“果然”,而被部分学者认定为合预期标记的“瞧”(邱闯仙,2010)和“我说什么来着”(吕为光,2011)的作用仍然是引导反预期信息,只不过它们标注的是违反听话者预期的信息。我们先不论“瞧”是否已经规约化为一个合预期标记,仅就谷文这一理解而言似有牵强。虽然言者的合预期信息常常是听者的反预期信息,但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如:

(5) 瞧,他又来了!

② 三个构式中的“说”重读,突显合言者的预期。“我说吧”若句尾语调上扬,则“说”无法重读。

③ 这里的“合预期信息”对应于吴福祥(2004)中的“预期(expectation)信息”。我们用“合预期”是为了突显它跟参照预期的关系,且与“反预期”对称。

④ “合预期标记”是标示合预期信息的语言手段,在谷峰(2014)文中记为“预期标记”。本文的“预期类标记”包括跟预期相关的合预期标记和反预期标记。

这里的“瞧”传达的是言者在确定当前的事态符合自己预期判断之后满足、炫耀的口气,并无隐含听者先前存在一个“他不会来”的预期。可能是无预期,甚至可能是跟言者相同的预期。实际上,Heine 等所谓的合预期信息无标记是相对于反预期信息来说的,汉语中也存在不少合预期标记,它标注当前断言与先前预期的情形或常规(norms) 之间的一致性。

2.2 单源预期和多源预期、所言预期和所含预期

合预期信息和反预期信息都跟参照预期有关。从传信的来源上来看,会话序列中的某一预期可以是言者自身发出,可以由听者发出,也可以是言谈参与者共享的常规。有的预期类标记只能标示相关的断言跟某一特定传信来源的预期相联系,如“我说什么来着”只表达言者当前的断言跟言者预期是一致的。我们将这样的标记称为“单源预期类标记”。而有的预期类标记可以标示相关的断言跟多种传信来源的预期相关联。如“X 不比 Y · Z”可以表达事态偏离三种不同传信来源的预期(参看吴福祥,2004) 。我们将这类标记称为“多源预期类标记”。因此,预期的表达跟传信密切相关。

预期有三种呈现形式: 一是以明确的命题形式直接出现在话语中; 二是隐含在语句中; 三是以零形式出现(吴福祥,2004) 。但零形式的预期都可以转化为言语编码形式。根据有无语用推理过程的参与,我们将它分为所言(what is said) 预期和所含(what is implied) 预期(“所言”“所含”参看 Grice,1989: 24、1991: 77) 。前者是不需要经过语用推理直接在语句中呈现出来的命题信息,但会有认识情态上的差异。后者需要通过语用推理获取,依赖的话段可以是直陈语气,也可以是疑问语气。所含预期的表达因为其间接性,并不承担某种社会行为。如:

(6) A: 小李明天要参加口语比赛的吧?

(7) A: 她怎么会迟到呢?

B: 是的,他正在准备呢。

B: 她的脚受伤了。

例(6) 我们通过 A 的话语,可以直接获取 A 的一个预期,即“小李明天要参加口语比赛”,虽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一个所言预期,该预期跟整个语段所要表达的命题信息一致。此外,我们还通过语用推理得到一个“比赛在明天”的所含预期。该预期在会话中并不承担社会行为。

例(7) 情况比较复杂,也跟本文密切相关。A 的话语是一个用“怎么”来追问原因的问句,“怎么”问句表达了一个反预期事态^⑤(参看祁峰、陈振宇,2013; 刘焱、黄丹丹,2015) ,即“她迟到了”。既然是“反预期事态”,那必然隐含言者一个与之相对的所含预期(一) ,即言者认为“她不会迟到”,这是通过语用推理所得的。如果出现一个偏离自己先前预期的反预期事态,当事人势必心存疑虑,即言者估测“反预期事态的出现必有其未知的真相”,这是言者提出疑问的前提。该质疑预期也是通过语用推理所得,我们记为所含预期(二) 。反预期信息根据传信来源和途径的不同,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即如果“她迟到”是 A 亲眼所见,反预期信息为真,所含预期(一) 为假。如果“她迟到”只是道听途说的,则反预期信息有可能为真,有可能为假。相应地,所含预期(一) 有可能为真,也有可能为假。

在汉语中,有的预期类标记只跟所言预期关联,如“并不/没”;有的标记只能跟所含预期关联,如“又不/没”(“并”“又”参看马真,2001) 。我们认为,无论是恍悟义的“我说呢”和“我说嘛₁”,还是非恍悟义的“我说吧”和“我说嘛₂”,它们都具有一个核心性能,即都用来标注合

^⑤ “怎么”原因问句可以用来单纯询问原因,如“你的手怎么流血了?”也可以倾向于反问或质问,如“他怎么会过来?”无论何种情况,都表达了一个反预期信息。对某原因的探索都是由于相关事件跟头脑中的标准或常规不相符引起的。(参看刘永芳,2010: 111)

预期信息,且传信来源都是直接来源。但“我说呢”关联所含预期,“我说吧”关联所言预期,“我说嘛”两者兼而有之。互动语言学认为,语法和交际互动之间是一种互育关系,语法结构在交际互动中建构起来。语言的研究需要在互动交际中关注语言形式是如何发挥交际功能的(Ochs et al., 1996; Selting & Couper-Kuhlen, 2001)。下面我们结合会话序列,考察三个习语构式与所含预期和所言预期之间是如何交互作用的。以下未标明出处的语料除个别简单的用例自拟之外,其余的均为本人收录的真实会话语料。

3. “我说呢”和“我说嘛₁”

3.1 会话序列和所含预期

“我说呢”和“我说嘛₁”涉及的典型会话序列应该是这样的:

前件(FPP): 质疑

后件(SPP): 解疑

后扩展序列(PES): 我说呢/我说嘛

其中FPP(first pair part)的质疑和SPP(second pair part)的解疑通常构成会话的“根序列”(base sequence),是一个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而“我说呢”或“我说嘛₁”处在“后扩展序列”(post-expansion sequence; 参看Schegloff, 2007: 28)中。这是两个习语构式所关涉的最典型的序列形式,具体会话中会基于这一典型形式有所变化。其中FPP质疑的话语只能编码为疑问形式Q,承担一个问询的社会行为。Q包含了“我说呢”或“我说嘛₁”成立的前提,即存在一个反预期信息与由此推出的所含预期(一)和所含预期(二),其中所含预期(二)是一个质疑预期。这些所含预期是语用推理所得,因此它们在交际中并不实施一种会话行为。

Q最常见的语言形式是包含“怎么/为什么”的原因问句。如:

(8) (R的导师到了毕业论文中期检查时都没对R的论文进行指导。)

1L: 这样的导师怎么还会让他带学生呢? 你们师兄师姐都是怎么毕业的? (FPP)

2R: 我们老师的臭毛病就是每隔一届就好好培养一个,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他。其他的师兄师姐都是自己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的。(SPP)

3L: 老奸巨猾啊,这样既不影响他的形象,又有时间拍马屁。我说呢,他怎么还能每年带学生。(PES)

(9) (L在听一首日本歌)

1L: 这首歌怎么会有两个歌手在唱呢? (FPP)

2R: 写错了,是一个,另一个是拉小提琴的,我认识他,他上过节目教别人拉小提琴。(SPP)

3L: 我说嘛,写着两个人,只听到了一个声音,我还找另一个人的声音找了好久。(PES)

学生L通过例(8)的划线部分Q表达了一个反预期信息,即“R的导师还能每年带学生”。这是一个已然事实,反预期信息必然为真,与之相对的所含预期(一)为假。于是L产生了一个质疑预期,即“R的导师能继续带学生应该另有隐情”。通过SPP部分的解疑,印证了这一预期。因此,R的解疑实际上表达了一个跟L的质疑预期一致的合预期信息。L在PES也表达了跟自己先前质疑预期一致的信息,即“他能继续带学生果然存在未知真相”。

例(9)L在听音乐时首先作出一个预期判断(一):歌声是由一位歌手所发出的。但从视觉上却获取一个反预期信息,即有两位歌手。于是就有了话轮1中的困惑。该问句包含了预期(二):说是两个歌手其中必有未知的原因。SPP中的回应解开了L的疑惑。L通过“我说嘛”表明了自己先前质疑的合理性,确实有未知的原因。

Q 也可以为是非问句。出现反预期信息的偏离常为主观理解的偏差所致。如:

(10) (L 买了两个月饼模子)

1L: 我买了两个,晚上养起来带过去。

2R: 这个买来要养的吗? (FPP)

3L: “养”是“擦一下油,浸一下”的意思。(SPP)

4R: 我说呢。(PES)

(11) 1L: 今天下午两点有个泽世奖学金的评比活动,喜哥让我们院出十个研究生,我们出八个,你们出两个,怎么样?

2R: 那奖学金咱也能评? (FPP)

3L: 咱们是去当观众。(SPP)

4R: 哦,我说嘛,以前喜哥说是不能的。可以。(PES) ⑥

例(10) R 根据 L 所谓的“养月饼模子”,通过主观推断得到一个反预期信息,即“月饼模子可以养”。R 的问询存在两个所含预期,即“月饼模子不能养”和“其中必有未明真相”。SPP 中 L 的应答印证了 R 的预期,表达了一个跟 R 一致的合预期信息。而 PES 中的“我说呢”则是发话者在先前的预期得到证实之后,对自己疑问句中所含预期(一)的重提,表达了一个跟自己先前预期一致的合预期信息。

上例都是关于“我说呢”或“我说嘛₁”典型的完整的会话序列。但 Q 有时只是说话者的心理活动,不一定出现在话语中,但可以通过 SPP 或 PES 推断出质疑的具体内容。如:

(12) (春节一大早)

1L: 给炮竹炸得一宿没睡觉,从天没亮就开始炸。

2R: 我说呢,今天起那么早!

例(12) 中 L 的疑惑 Q 没有在话段编码中出现,但我们可从“我说呢”的后续话轮中得到提示,即 Q 为“L 今天怎么起那么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解疑之后有两个结果:一是反预期事态为真,所含预期(一)为假,质疑预期也为真,如例(8);一是反预期信息为假,所含预期(一)为真,质疑预期为真。如例(9)。在会话的推进过程中,这些信息的真假性逐渐呈现出来,影响“我说呢”和“我说嘛₁”后续话轮表达形式的塑造。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厘清“我说呢”或“我说嘛₁”在 PES 中所要关联的信息是否正是 Q 的所含预期。这需要结合“我说呢”“我说嘛₁”在省缩之前“我说+P+(呢/嘛)”结构来证明。

3.2 “我说呢”和“我说嘛₁”表达的合预期信息

在汉语中,不带互动性语气词的“我说”也可以表达恍悟义。董秀芳(2003)从词汇化的角度认为它是一个语气词。刘颖(2008)从语用化的角度认为它是一个话语标记。无论将它定性为语气词还是话语标记,“我说”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调单位单说,后面必须带上小句 P。P 都是言者要提请听者注意的信息。全句句末可带语气词“呢”或“嘛”,但绝大多数情况带“呢”。如:

(13) 1L: 我这个手机卡没有流量了,就换了我另一张卡。

2R: 难怪,我说你手机怎么关机呢。

(14) 1L: 帮我关注一下一个公众号,“浙里生活”,搜一下。

⑥ 第四话轮既可以分析为是第二、三话轮的 PES,也可以跟第一话轮构成一个根序列。

2R: 搜不到啊。

3L: 是“浙里金华”，一激动说错了。

4R: 我说没有这个号呢。

“我说”之后都不能有语调上的停顿。其中 P 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怎么/为什么”问句的形式出现，但没有疑问语气，记为 P_1 ，如例(13)，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二是以命题陈述的形式出现，记为 P_2 ，如例(14)。这个命题形式的 P_2 可以转化成 P_1 的形式。“我说没有这个号呢”可说成“我说怎么没有这个公众号呢”。

如果说话者要突显恍然大悟的情态，则在“我说”之后带上语气词“呢”或者“嘛”，使之变成自立的单句，才可从小句提取出来后置。如：

(15) 1L: 妈，王 XX 有新女朋友了。

2R: 我说呢，他怎么和你了断得这么彻底，没有任何消息。他身边肯定早就出现别人了，就你傻！

由于“我说呢”和“我说嘛₁”是独立的语调单元，P 作为后续话轮，位置比较灵活，甚至可作为言谈参与者的共享信息而省略。但根据“我说呢”“我说嘛”与“我说+P+(呢/嘛)”的关系，我们可以推断“我说呢”“我说嘛”关联的信息是 P，其中“怎么/为什么”疑问形式的 P_1 是对 Q 的引述，如例(8)(9)。言者引述包含自己预期的疑问形式 Q，旨在重申自己先前质疑的合理性；而 P_2 是 Q 的其中一个所含预期。说话者通过直接重提先前的预期，实现了表达合预期信息的目的，如例(14)。可见，无论“我说呢”和“我说嘛₁”关联的语言形式是 P_1 还是 P_2 ，这两个构式都旨在强调 Q 的所含预期。其中“说”在语调上重读并拉长，这也说明言者意在强调跟“说”有关的预期。这恰恰跟“呢”的“提请注意”说(Wu, 2005; 方梅, 2016)相互印证。

在会话序列中， P_2 都可以替换成 P_1 的形式，但 P_1 不一定都能替换成 P_2 ，这取决于 FPP 中反预期信息的真假。如果在解疑后，反预期信息确定为真，那么说话者所要表达的合预期信息只能是质疑预期，在 PES 中只能通过 P_1 的形式来强调跟质疑预期一致。如在例(8)的 PES 中就不能说成“我说呢，他不能每年带学生的”。“他不能每年带学生的”虽是 L 的所含预期之一，但并非他的合预期信息。如果通过 SPP 的释疑确定反预期信息为假，言者的两个所含预期都为真，则 P 的两种形式都成立，如例(9)。这可以证明“我说呢”和“我说嘛₁”是一个合预期标记，而且关联的是所含预期。因此，可以把“我说呢”和“我说嘛₁”的典型会话序列具体化为：

前件(FPP)：质疑。疑问句 Q 表达一个反预期事态，并隐含一个跟反预期事态相对的所含预期和出现反预期事态的质疑预期。

后件(SPP)：解反预期。表达了跟发话者某个所含预期一致的预期信息。

后扩展序列(PES)：“我说呢/我说嘛”用在解反预期之后，通过重提 Q 或者 Q 所包含的预期，表达跟自己某个所含预期一致的合预期信息。

3.3 “恍悟”义从何而来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我说呢”和“我说嘛₁”是合预期标记，即通过“我说呢”或“我说嘛₁”引述或者强调先前的预期来达到表达自己预期合理性或者准确性的目的，有时还附带言者自我满足和自我欣赏的情感。然而，作为所含预期标记的“我说呢”和“我说嘛₁”跟恍悟义有何联系？

吕叔湘(1980)、常玉钟(1993)和张先亮等(2015)都认为“我说呢”表达“忽有所悟”义。我们认为，“恍悟”义并非基本意义，而是在某个特定语境中的浮现意义。“恍悟”义作为“我说

呢”与“我说嘛₁”的构式义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似乎很难论证原本作为传信语的“我说”跟“恍然大悟”之间的理据关系。事实上,很多习语构式形义之间的不可预测性跟我们未能发掘到它的核心意义有关。“我说呢”与“我说嘛₁”何以能表达“恍悟”义?跟它作为合预期标记是否矛盾?其实,两者并不排斥。对某反预期事态另有隐情的判断就是一个所含预期。若听者指出了事件的真实情况,令言者“忽有所悟”,便是证明了言者质疑的合理性,即言者的所含预期为真。如果 Q 是表达中性信息的疑问句,并不包含一个预期,则言者在听者的解疑之后虽有所悟,但也不能用具有所谓“恍悟义”的“我说呢”与“我说嘛₁”来回应。如:

- (16) 1L: 你是哪里人?
2R: 北京人。
3L: 我说呢。/ 我说嘛。

例(16) 如果使用“我说呢”与“我说嘛₁”来回应,条件是问句中包含说话者的预期,而实际情况跟该预期一致。如果言者在问询时没有任何预期,则在 PES 中不能用“我说呢”或“我说嘛₁”进行回应。因此,“恍悟义”是相对于“存疑”而言的,而“合预期”是相对于“所含预期”而言的。表达恍悟和表达合预期信息是同时的。

4. “我说吧”和“我说嘛₂”

4.1 会话序列和所言预期

“我说吧”和“我说嘛₂”跟“我说呢”和“我说嘛₁”典型的会话序列都关涉三个话轮。即:

- FT: 直接表达一个所言预期 E。
ST: 证实了事态与该预期的一致性。
TE “我说吧”或“我说嘛₂”,合预期信息 F。

在 FT(the first turn) 中发话者直接表达一个所言预期,实施的是一个评价、判断或预测的会话行为。而 ST(the second turn) 证实了 FT 中发话者的预期。跟“我说呢”和“我说嘛₁”不同的是,FT 和 ST 常常不构成一个相邻语对,是一种松散的时间线性呈现关系。ST 未必都是言者针对对方预期的有意回应,却可能无意触发了听者的预期,并证实了该预期的真实性。在 TT (the third turn) 中通过“我说吧”“我说嘛₂”重提先前的所言预期,再次宣告该预期的真实性,表达了一个跟自己预期一致的合预期信息。如:

- (17) (家长 M 和 F 在老师 T 那里给儿子报围棋兴趣班)
1T: 那爸爸的意思呢?
2M: 他不管的,问他等于白问。(FT)
3F: 报也可以,不报也可以,都是孩子玩儿玩儿的,他妈妈定了就好了。(ST)
4M: 我说吧,孩子兴趣班的事情他就从来没上心过,都是我一个人接送的。(TT)

- (18) 小赌这才又补充说明“麻婆豆腐,又泼又辣,吃不消呀!”(FT) 小飞雪这才明白,原来小赌绕着圈子骂她泼辣,飞起一脚,没踹着小赌,顺手抓起茶杯,泼个彻底。呵呵! 当头冷水,大概就是这个淋法吧! 小飞雪双手叉腰,坐在桌旁,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小赌叹口气,用衣袖抹抹脸,方道“唉! 我说嘛,麻婆豆腐不好吃呀!”(TT) (《酒狂任小赌》)

例(17) 在 FT 妈妈直接表达了一个“爸爸是不管孩子兴趣班的事的”预期 E。而爸爸的回应是针对老师的问询的,但却刚好证实了妈妈所言预期的真实性。妈妈在 TT 中通过“我说吧”重提所言预期,表达了一个合预期信息 F,以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F 并非是对 E 的直接引述,但两者传达相同的真值条件意义。例(18) 小赌在 FT 中表达了一个预期。但小飞雪通过非言

语举动作了回应。这些行为举动却印证了小赌所言预期的准确性。于是在“我说嘛”的后续话轮中再次引述先前的预期,以彰显自己判断的合预期性。

由于 FT 和 ST 不构成一个相邻对,ST 并非针对 FT 中预期 E 的有意回应,且在 FT 中,说话者往往不止表达一个所言预期。因此在 TT 中,F 一般不省略,言者需要向听者指明具体的预期信息。因此在我们收集的文本口语语料和自然口语语料中均未发现“我说吧”或“我说嘛₂”单独成话轮的用例。而“我说呢”和“我说嘛₁”在 PES 中表达合预期信息时,P 常常可以省略,单独成为一个话轮。

另外,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E 在会话序列中出现的情况较少。所言预期因为跟言谈事件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常常不出现在对话中。它是一个有待被激活的背景预期。如:

(19) 1L: 你是法学系的吗? 还是外语的?

2R: 都不是,我是中文的。

3L: 我说嘛,我们工科的女孩子没有这么细的。

(20) 1L: 老姨,我们分手了。

2R: 我说吧,当初不让你谈,你也不听啊,现在怎么样? 白白浪费时间精力,多伤脑筋!

例(19)中 L 关于“工科的女孩子没有这么细”这一预期并没有出现在会话序列中,而是跟当前对话存在时间差的潜在信息,在言语编码之外。例(20) L 的话段是相关话题的始发话轮。

“我说吧”和“我说嘛₂”不能关联在某个命题形式中通过语用推理得出的所含预期。我们以例(6)为例:

(6') A: 小李明天要参加口语比赛的吧?

B: 是的,他正在准备呢。

* A1: 我说吧,比赛在周六。

B2: 我说吧,他会参加的。

例(6')中 L 直接表达的预期是“小李明天要参加口语比赛”,“比赛在周六”是所含预期。因此 L 在 PES 中不能用“我说吧”“我说嘛₂”表达与该所含预期一致的信息,但可表达与所言预期一致的信息。

可见,“我说吧”或“我说嘛₂”也是用来表达跟自己预期一致的习语构式,但只关联所言预期,不能引述所含预期,并且对后续话轮的强制性比“我说呢”和“我说嘛₁”高。

“我说吧”和“我说嘛₂”跟“我说呢”和“我说嘛₁”一样,都存在省缩前形式,即“我说+F+吧/嘛”结构。其中 F 是先前的预期,“我说”的作用就是为了引述这个预期。如:

(21) 1L: 这披萨饼怎么那么难吃啊!

2R: 我说不好吃吧,外卖就是对食物的不尊重,有些东西必须堂食。

(22) 我说我已经步入老龄化了吧,你还不信,都爱上运动鞋了。

我们可以把“我说+F+吧/嘛”中的 F 提取后置作为“我说吧”或“我说嘛₂”的后续话轮。而“我说吧”或“我说嘛₂”标注的合预期信息正是 F。

4.2 “我说吧”和“我说嘛₂”的功能分布差异

“我说吧”和“我说嘛₂”都具有标示当前事态跟言者所言预期一致的功能。但两者的功能分布存在细微的差别。“我说吧”表明先前言者的所言预期跟听者存在一定的分歧^⑦。而“我说嘛”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如例(19)。

^⑦ 这一点是方梅老师发现并告诉笔者的,特此感谢。

(19') 1L: 你是法学系的吗? 还是外语的?

2R: 都不是,我是中文的。

? 3L: 我说吧,我们工科的女孩子没有这么细的。

例(19')中LR是第一次会话,L不可能在此表达过所言预期,也就不可能存在认知上的分歧。因此在TT中的回应不能用“我说吧”。既然存在分歧,言者的所言预期也是听者的已知信息。但“我说嘛₂”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即言者在表达合预期时,只向听者宣告自己的所言预期为真,而听者并不一定知晓言者先前的所言预期。

此外,“我说吧”比“我说嘛₂”对后续话轮的强制性更高。试比较:

(23) 1L: 那《神奇的女侠》没获最佳影片奖。

2R: 我说嘛,那么花哨的电影怎么可能获奖啊,虽然我是很喜欢的。

? 2R1: 我说嘛。

?? 2R2: 我说吧。

用“我说嘛”单独回应比“我说吧”单独回应的接受度更高。可见,“我说嘛₂”比“我说吧”的功能分布更广,这跟互动性语气词的核心性能不无关系。

5. 从习语构式看“呢、嘛、吧”的功能差异

在规约化之初,三个习语构式中的互动性语气词,除了让“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获得独立语调单位的资格之外,它们本身所传递的情态功能也是有差异的。对于互动性语气词表达何种性质的语气,历来说法不一。相关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不同语境的。即使可以自省设计一些语境相同的用例进行对比,但由于这些用例没有形成一个规约化的意义,也就很难将某一功能落实在某个语气词上,从而难以发现不同的语气词之间一些区别性或对立性的特性。“我说呢”“我说嘛”和“我说吧”是语义规约化了的习语构式,它们之间的最小对比项是“呢”“嘛”和“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三个习语构式的构式义和语境分布的差异便是这三个互动性语气词的功能,或者跟语气词是相关的。

5.1 “呢”和“嘛”

“呢”和“嘛”都是语法学家们十分关注的语气词。目前学界也取得了一些大致一致的认识。我们列举几种关于“嘛”的代表性观点。吕叔湘(1980/1999: 380)将“嘛”解释为表示事情理应如此或事情显而易见的语气助词。北大中文系(1982: 329)认为“嘛”用于加强肯定语气,表示“理所应当”。Chappell(1991: 47)认为“嘛”的一个用法是,说话者根据先前的讨论或者他们共享的文化知识,提醒说话人整个论题是显而易见或者不言而喻的。屈承熹(2006)认为“嘛”有两个基本的功能,即语义层面的预设功能和话语层面的执著功能。这几种观点虽表述略有差异,但都包含“嘛”的“显而易见”性。“显而易见”说本质上也是向听者“强调”的互动说,至少这两种功能在分布上并不对立。

我们再看“呢”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的看法是“呢”表确认,有指示和铺张的语气,表明事实显然,叫人信服。Li和Thompson(1981: 300-307)支持“对期望之回应”说,认为“呢”是引起听者注意并告知当前的话语跟先前的陈述有关。Wu(2005)认为“呢”的功能是提醒听者注意,以调整共识。方梅(2016)的分析认为,“呢”是一个互动性语气词,无论位于句中或句末,都是提示听话人关注。后附于疑问结构时,体现言者对当前话题的评价和态度。几位学者都看到了“呢”的互动性,即言者希望引起听者的注意,从而达成共识。

通过多方论证,“呢”无疑具有这样的功能。但“呢”表“强调”“提醒”的互动功能并不具区别性,这应该是互动性语气词的共性,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需要强调的命题信息末尾可以带“嘛”却不能带“呢”。以本文研究的习语构式相关的用法为例。如:

- (8) a. 我说呢,他怎么还能每年带学生。 b. 我说他怎么还能每年带学生呢。
c. 我说他怎么还能每年带学生嘛。 d. 我说嘛,他怎么还能每年带学生。
(23) a. 我说嘛,那么花哨的电影怎么可能获奖。 b. 我说那么花哨的电影怎么可能获奖嘛。
? c. 我说那么花哨的电影怎么可能获奖呢。 * d. 我说呢,那么花哨的电影怎么可能获奖啊。

例(8)(23)言者都要强调一个合预期信息,都希望得到听者认可,但前者可用“呢”和“嘛”,后者只能用“嘛”,不能用“呢”。可见,“呢”用于“强调”“提醒”时是有特定分布的,跟“嘛”应该存在一些对立性的特征,即“呢”可以提醒听者注意“什么”。本文限于篇幅对于“呢”的功能分布不作系统展开,仅说明“我说呢”和“我说嘛”语用功能差异跟语气词的关系。

“我说呢”关联的是所含预期,它预设言者获悉有关当前事态的真实情况,这是言者作出“我说呢”这一评价的前提。因此在“我说呢”之后,都可以补充“原来……”。如:

- (8') 我说呢,他怎么还能每年带学生。原来是他集中资源带好一个学生啊。
(11') 哦,我说嘛,以前喜哥说是不能的。原来我们是去当观众的。

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就有不少用例在“我说呢”的话轮中紧跟着“原来……”句,这是“我说呢”所预告的信息。如:

- (24) 1L: 美儿被奶奶带得小脸都有肉肉了。
2R: 我说呢,看照片怎么感觉脸肿了,原来是胖了啊。
(25) 几个大妈高一声低一声地说“我说呢,就她那疯样,能找上税务局的,原来是偷人,真不要脸,那男的看他丈母娘打她还跑了,哈哈”(《彪悍丈母娘恶惩出轨男》)

无论后续有没有出现表示“真实情况”的编码形式,“我说呢”都关联着该预设信息。King (1986: 27) 提出了“呢”的“背景信息的评估者”说^⑧,并将“呢”的功能分布总结为以下4种:一是重复新引入的信息或预设信息(presupposition information);二是反诘句;三是解释插入成分中有关先前的解释;四是直接呼告。其中的“预设信息”给本文的研究带来启示,如:

- (26) 为什么两岸有这种情形……想法之一呢,就是因为海峡两岸都有相同的问题。(引自 King, 1986: 29)

屈承熹(2006: 129)认为该例中的“想法之一”跟“预设信息”与“前景”无关。我们赞同King文的分析,“想法之一”预设言者存在多种想法。“呢”起到强调“想法之一”,提示听者追踪下文“其他想法”的作用。相应的,“我说呢”中的“呢”则起到指示听者追踪其中所预设的“真实情况”的作用。除此之外,“还NP呢”(还大学生呢)中的“呢”也跟预设信息共现,它提醒听者注意“评价客体没有达到某个典型的具体标准”这一信息,如我们可以说“还大学生呢,连这个字都不认识”。“连这个字都不认识”是言者作出“还大学生呢”这一评价的前提。

而例(23)中的命题“那么花哨的电影不可能获奖”理论上可以强调,但它作为言者直接表达出来的所言预期,不存在需要“呢”去预告和指示的预设。在形式上,除了合预期信息之外,后续话轮也没有呼之欲出的与之存在必然关联的背景信息。屈承熹(2006: 127)解答了何时需要“呢”的问题,“当话语内容与话题框架没有明显的联系时,关联助词的使用要比二者有明显的联系时更有必要。”显然,所含预期比所言预期与话题框架的关联度要弱,更需要通过

^⑧ King(1986)认为“呢”用于强调或评价话语所包含的背景信息,并引起听者对这些信息的注意。

“呢”去关联。

5.2 “吧”和“嘛”

“我说吧”和“我说嘛”都可以关联一个所言预期,但是两者的语境分布有差异。“我说吧”关联的所言预期是跟听者存在分歧的,而“我说嘛”没有这样的限制。因此,“我说吧”在TT中,有“求定”“商议”的情态功能。而“我说嘛”则有“我的所言预期显然是对的”的语气。这跟“吧”和“嘛”的基本功能是相互印证的。关于“吧”的语气说法很多,如“揣度”“估测”“迟疑”“不确定”“求证”“商议”等,这些功能看似相近,实则不同。其中包括两类,一类是“互动”说,如“求证”“商议”等;一类是“非互动”说,如“揣度”“迟疑”等。前者的研究结论是基于话语层面,而后者则大多局限在句子层面。“我说吧”和“我说嘛”的功能分布差异恰恰印证了“互动”说,即“我说吧”用于言者与听者预期分歧之后的“求定”。其中“吧”实现“分歧求定”的功能。而“我说嘛”是对自己预期被证实之后的坚持,“嘛”带有“理所当然”的语气。

6. 余论

本文从互动语言学的视角,将一组习语构式“我说呢”“我说嘛”和“我说吧”置于会话序列中进行考察,发现这三个习语构式都是通过预期重提的方式来表达合预期信息的,但它们对先前预期呈现方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与“我说吧”关联的必须是直接“说”出来的所言预期,无论话语内的还是话语外的,在言语交际中关联评判或估测的会话行为。而与“我说呢”关联的并非直接表达,而是说话者“认为”的所含预期,预期的表达本身并不承担会话行为,但它所依赖的话段却实施一个质疑的会话行为。“我说嘛”则兼具“我说呢”和“我说吧”的功能,它所关联的预期既可以是直接表达出来的所言预期,也可以是通过语用推理所得的所含预期。这三个习语构式的构式义都跟“说”的基本义密切相关,但“我说吧”中的“说”在语义上还保留一定程度的言说义,“我说呢”中的“说”已发展为认识动词,“我说嘛”中的“说”介于两者之间。三个构式之间的功能和分布差异跟最小对比项“呢”“嘛”“吧”不同的互动功能有关:“呢”是提请听者注意,在“我说呢”中是指话语的预设信息,“嘛”表示对论题的坚持,有“理所当然”的语气;而“吧”表示分歧的求定功能。下面有几个跟本文相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1) “我说吧”“我说嘛”和“我说呢”都是在“我说”的基础上带上语气词固化而成的习语构式。在汉语中有为数不少的“X+语气词”习语构式,我们姑且将它们称之为“语气词构式”。如“至于吗”“何必呢”“何苦呢”“管他呢”等,它们都是“X+S+语气词”的省缩形式,其中X都位于句首,不能单用,只能后附一个小句。X只有带上一个语气词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调单位。这是否是汉语习语化的一条路径?

2)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预期信息的表达跟传信密切相关。“我说吧”“我说嘛”和“我说呢”都是合预期信息标记,其关联的预期都来源于说话者自身“我”。那么,我们能否做一个假设:一个语言形式最终演化为合预期标记还是反预期标记跟它关联的预期的传信来源有关?比如“我说什么来着”,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合预期标记,而不是反预期标记,跟它所关联的单一的说话者自身的预期传信来源有一定的联系。而反预期标记是否大多跟多源预期存在偏离关系?这需要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编) 1982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第 5 期

• 573 •

- 常玉钟 1993 《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董秀芳 2003 《“X 说”的词汇化》，《语言科学》第 3 期。
- 方 梅 2016 《再说“呢”——从互动角度看语气词的性质与功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八)，商务印书馆。
- 谷 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 8 期。
- 李 冰 2009 《“果然”与“果真”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汉语学习》第 4 期。
- 刘 颖 2008 《“我说”的语义演变及其主观化》，《语文研究》第 3 期。
- 刘 焱 黄丹丹 2015 《反预期话语标记“怎么”》，《语言科学》第 2 期。
- 刘永芳 2010 《归因理论及其探索》(修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 1980/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吕为光 2011 《责怪义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汉语学报》第 3 期。
- 马 真 2001 《表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并”和“又”——兼谈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 祁 峰 陈振宇 2013 《焦点实现的基本规则——以汉语疑问代词为例》，《汉语学报》第 1 期。
- 邱闯仙 2010 《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第 2 期。
- 屈承熹 2006 《汉语篇章语法》，潘文国等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吴福祥 2004 《试说“X 不比 Y · 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 3 期。
- 张先亮 倪妙静 2015 《试论恍惚义构式“我说呢”》，《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张则顺 2014 《合预期确信标记“当然”》，《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Chappell, Hilary 1991 Strategies for the assertion of obviousness and disagreement in Mandarin: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modal particle *Me*.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1(1): 39-65.
- Du Bois, John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Robert Englebretson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139-182.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Grice, H. Paul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ce, H. Paul 1991 *The Conception of Valu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ng, Brian 1986 Ne - A discours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1(1): 21-46.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chs, Elinor, Emanuel A. Schegloff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1996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pper, Karl R. 1972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
- Schegloff, Emanuel A.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lting, Margret and Elizabeth Couper-Kuhlen (eds.) 2001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u, Guo 2005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particle NE in Statement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40(1): 47-82.

郑娟曼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 zhengjuanman@ 163.com

influence of Southwest Mandarin, have been remarkably preserved in Xianghua. In this regard, it is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the early Xiang dialect by comparing modern Xiang dialects with Xianghua.

Key Words: Xianghua (乡话), *zhi/zhi/zhi* (支脂之), strata, Xiang dialects

CHEN Qianrui, WANG Jiho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yi* (矣) in *Zuo Zhuan* (左传): A quantific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system in the typological studies of tense and aspe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quantificational analysis of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yi* (矣) in *Zuo Zhuan*. It is found that *yi* is most often used to indicate a perfect aspect and expresse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perfect marker use. The imperative function of *yi* is derived from its function of expressing ‘future’. The perfect function of *yi*, given that the usage of *yi* as a completive marker is not observed, may originate from the resultative meaning.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usage data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yi*,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tense and aspect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 well as its diachron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Old Chinese, *yi* (矣), multi-functionality, quantificational analysis, typology

ZHENG Juanman, What-is-said expectation and what-is-implied expectation: An analysis of *wo shuo ne* (我说呢), *wo shuo ma* (我说嘛), *wo shuo ba* (我说吧) in talk-in-interaction

The idiomatized collocations, *wo shuo ne* (我说呢), *wo shuo ma* (我说嘛) and *wo shuo ba* (我说吧), are a set of constructions which consist of a conventionalized phrase *wo shuo*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ractive particles such as *ne* (呢), *ma* (嘛), *ba* (吧) respectively.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s emerge within social interaction expressing speaker’s expecta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what-is-said and what-is-implied. Based on data from conversation, the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on of expectation and the language forms among these three constructions. It suggests that all of them can be used to signal expectations, but *wo shuo ne* corresponds with what-is-implied expectation, *wo shuo ba* with what-is-said expectation, and *wo shuo ma* with both expectations. This paper also offers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to study the function and sequential organization of interactive particles in natural occurring language.

Key Words: interactive particle, what-is-said expectation, what-is-implied expectation, conversation sequence

QIN Dongsheng, QIN Fengyu, On the particles of manner and selection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Zhuang language in Guangx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act linguistics, this paper makes an inquiry into the manner and selective particle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Zhuang language of Guangxi.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1) Those two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re are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and Zhuang in Guangxi as well as other Tai languages, and they have been transferred from Zhuang to Chinese dialects due to long lasting and intensive language contact. 2) The verb *au*¹ (取, take) underwent a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becoming a manner particle as in the “V+*au*¹+O”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SVC). The different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respect to SVC between the Zhuang language and Chinese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to identify the model language and the replica language. 3) A bidirectional transfer is also found in the manner particle between Zhuang language and Chinese.

Key Words: manner particle, selective particl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bidirectional transfer